

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



顾问

陈光兴

吕正惠

孙歌

许江

张颂仁

人間 思想

第一辑

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

主编

贺照田

高士明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人間思想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贺照田,高士明主编.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8
(人间思想;1)

ISBN 978-7-5155-1106-1

I. ①作… II. ①贺…②高…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1379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人间思想01: 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

作 者	贺照田 高士明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106-1
定 价	6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编: 100102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一

本集刊名“人间思想”，动力之一在凸显我们和八十年代陈映真所办《人间》杂志的精神承传关系。

陈映真主办的《人间》杂志是月刊，1985年11月创刊，1989年9月终刊，共出了47期，差一期满四年。

为什么一本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杂志还让今天的我们这么不能忘怀？简要地说：这，既来自陈映真及其团队在近四年的出版中做出的多方面丰盈实绩，更由于这些实绩背后陈映真及其团队对《人间》的灵魂赋予。

陈映真为《人间》写的发刊辞^[1]名“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除去对杂志筹办中给以帮助人们的两段感谢，这不长的发刊辞全文如下：

二十多年来，由于整个社会的勤勉工作，我们已经在台湾创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饱食的社会。这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成就，也使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那就是因为社会高度的分工组织化，造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一个生产部门与另一个生产部门之间、一个市场与另一个市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相互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

写在前面

贺照田

此外，在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里，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之商品的消费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丧失了目标。我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我们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

《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杂志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透过我们的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

如果您还问：为什么在这荒枯的时代，要办《人间》这样一种杂志？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有立足的余地。不，我们不信！

因此，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

《人间》是属于每一个关心人、关心生活、关心台湾——我们可爱的家乡的人们的杂志。她的园地公开，没有门派的限制。

我们欢迎一切关怀的、富有希望与爱心的报道摄影家和报道文学家联手创作，寄来优秀的作品。

我们更需要全社会以订阅和爱读来支持《人间》，因为《人间》是您自己的理想，您自己的杂志。

朋友们，支持《人间》！因为我们心中的关怀、希望和爱，正急切地需要一个再生和滋长的机会。

从这篇不长的发刊辞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陈映真对《人间》的历史—社会任务设定是：用具体、直接的图片和文字来重新唤起人们的情感，激动人们的心，以在一个社会生活过于被工商、金融逻辑制导，日常生活过于被消费主义笼罩、侵蚀的社会中，通过让人们对他人的社会关心的苏醒，使一种更人性的生活重新变得可能，一个更人性的社会重新变得可能。

当然，《人间》所以成为大家读后不能忘记的《人间》，不在《人间》强调人性和爱，进行这种倡导的杂志很多，而在《人间》所强调的人性和爱，是与细腻的社会、历史、人心体贴，细腻的社会、历史、人心透视，细腻、突出的问题捕捉、赋形能力，更细腻、敏锐、展开的正义追求相伴随的。

而为什么陈映真在当时会有这样一些意识、感觉，且这些意识、感觉会强烈到让他放下他当时正创造力旺盛的思想、文学写作，不顾一切地投身到《人间》当中？则和他这时的核心思考有关。

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陈映真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充分信仰，认为台湾的出路就在尽早进行一场同样的革命。但“文革”后中国大陆对陈映真曾真诚信仰的毛时代问题的暴露与批判，让陈映真先前认为正义、美好的社会可通过一场同样的革命到达的信仰受到强烈打击。正是以这一打击为背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陈映真开始思考，当通过一次性革命来根本重置一

个社会以解决这社会问题的路径遭遇挫折，是否意味着人们在一个看起来已经现代化或已在现代化路途上的社会中只能随波逐流地活着？对此，陈映真的回答是：决不！而如此回答，是因为他清楚看到，爱的付出与意义感的获得不仅为人性所需要，而且一个即使看起来已经很有成绩的现代社会，若经过这个社会润泽、敏感、跳动的人心的充分别发、批判与检证，绝不会自动成为一个更人性、正义社会的。也就是，这时的陈映真深切感觉到，他先前信仰的革命的挫折，绝不意味着理想主义的虚妄，而恰恰意味着：正因为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可走，理想主义反更不可或缺，反更任重而道远！

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时的陈映真和《人间》的探索当然所关重大。因为这时的陈映真的思想探索所处理的问题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和社会主义信念、实践紧密相关的理想主义，在社会主义理念、实践遭遇挫折时，应该如何在思想和实践上对此理想主义重新加以安置，以在思想和实践上最大限度顺承和转化此理想主义；而这时《人间》的编辑和出版，则根本涉及：如何让有着更展开人性关怀、更展开正义关怀的理想主义，在陈映真原本欲用革命超越，并已在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当成就的当时台湾社会，找到它具根本建设性意义的介入形式，以让这一社会中人们的生命更饱满、发抒，这一社会本身更人性、更正义、更实质而非表面上充实、丰富。

显然，对当时的陈映真来说，当然是这些问题，而不是个人的文学、评论写作表现，更是他思牵魂系的中心，不理解这个，便不能真的抵达创办《人间》时陈映真思想感觉的核心关键。而无疑，这些思考也正是“文革”后中国大陆最应该追问，不追问也回避不掉的历史、思想关键；同样，《人间》的探索、累积方向，无疑也正是现代化虽然有成，但精神、社会问题多多的今天中国大陆，所正迫切需要正面探索、展开的。

正是这样一些与陈映真和《人间》的共鸣，让我们非常愿意把我们主编的这一集刊命名为《人间思想》。并且这一命名对我们来说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致敬，而更是一种决意，我们一定努力使《人间思想》和《人间》心魂相通的决意。

二

决意使《人间思想》和《人间》心魂相通，第一辑除却郑鸿生先生《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一文疑似外，既无报道摄影也无报导文学，而主要是论文、评论、思想随笔，一定会让读过《人间》的读者不满：要心魂相通，为什么外形却如此南辕北辙？外形南辕北辙，就不碍心魂相通吗？

是，这些问题问的很好。作为陈映真和《人间》的共鸣者，我们当然知道陈映真对《人间》的设定：用具体、直接的图片和文字来唤起人们的情感，激动人们的心，以让人们的心、情走出过去的闭锁，重新感受、理解世界，重新构想自己的行为、生活，好且重要，并且这也是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大陆当前出版实际上正缺乏的。是以《人间思想》只设定与《人间》心魂相通，而不设定形神俱通，并非我们对《人间》的内容呈现方式有异辞，而是和我们编者平素积累有关、能力所在有关，及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积累和能力，对《人间思想》进行的具体设定有关。

就是虽然我们对学院现状不满，对其有种种尖锐批评，学院仍是我们最熟悉的，学院中种种对现状具反思、批判、探索自觉的活泼力量，仍是我们开始编辑《人间思想》时最能依赖的力量，而这直接决定着《人间思想》第一辑的面貌。不过，随着作为编者的我们积累的展开，《人间思想》会有越来越多刊登形神俱通《人间》的、直接呈现世界的报道文字与报道图片，以直达人们的情感和心。

但如此并不表明《人间思想》中的“思想”二字只是权宜之计，在我们，它将始终是《人间思想》具根本结构地位的构成要件。首先，它是我们每次编辑工作具体进行的基本依托点。对我们而言，我们所以有动力编辑《人间思想》，当然基于我们对今天中国大陆所处历史时刻的判断和认识，但也基于我们对如下状况的深刻感触，就是我们每个人本来每天都生活在“人间”，但为什么中国大陆多数人的“人间”感却出了问题？从而使如何抵达“人间”在今天成了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相当意义上，是对今天中国大陆所处历史时刻的我们的理解，我们根据此理解对自己的责任设定，和对今天中国大陆“人间”问题的整理与思考，共同帮助我们在面对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以“人间”之名给出的叙

述与论述时，做出我们的判断和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说“思想”是我们每次编辑工作得以进行的基本依托所在。

如此说，当然并不表明，我们自认有能力绝对准确裁断：哪些是真的“人间”？哪些是伪“人间”？哪些是恰切且平衡的“人间感”？哪些不是？就是，作为编辑，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能力和我们的工作责任间存在不对称；就是，作为编辑我们必需裁断，但事实上我们又没有使我们的裁断一定可靠、完美的能力。

对这一能力和责任间不对称的自觉，使我们的判断一定是开放的。当然，开放不表现在我们不裁断，而表现在我们对我们自己能力限度的高度自觉，和诚实面对这不足所做出的关于《人间思想》内容结构上的设计。就是，《人间思想》在我们的考虑中，并不是以“人间”“思想”一方为重，另一方则活泼点缀其中的园地，也不是“人间”与“思想”的并行园地，而是“人间”与“思想”辩证的园地。

这一考虑特别表现在“当‘人间’逼视思想”和“在‘人间’思想”这两个栏目名称中。如此是因为我们的编辑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以我们自己的认识状况为基准，而我们又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不自信，因此，我们会热烈欢迎那些能把我们已有的观念、感觉逼视到不安的“人间”呈现、“人间”理解。因为不是让我们感觉自己正确的“人间”呈现、“人间”理解，而是这种会让我们已有观念、感觉被逼视到松动、不安的“人间”书写，才最有助于开启我们去认识——那些本在“人间”存在，但过去我们因不具备相应的视野、知识、能力，因此未能有效去认识和理解的“人间”部分。而这种帮助、开启，当然最有助于我们的视野、感受、判断、思考更充分、展开地“在人间”。

希望自己真的充分、展开地“在人间”，也是我们刊名“人间思想”外，还会不怕别人觉得我们单调，再特别开设“在‘人间’思想”的原因。因为这些来自“人间”且努力把其提升到“思想”的工作，不仅同样可以打开、修正我们，而且可直接充实提升我们的有关思考。

当然，我们所以特别看重“当‘人间’逼视思想”和“在‘人间’思想”这两个栏目名字，除上述原因外，还在于把这两个栏目名字关联起来呈现出的意涵。就是，我们希望《人间思想》所呈现的“人间”，是更有逼视、调校现有思考力

量的“人间”；而特别关注“人间”对“思想”的逼视与调校，是希望更多产生真的“在人间”的有效思考，而不是自以为在“人间”，其实不相干。而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会是能有效帮助我们抵达“人间”、理解“人间”的“思想”；我们也才真把“人间”变成——可抵抗、平衡以政治、经济种种之名，乃至以“人间”之名，实际上却在伤害“人间”，牺牲“人间”的知识和思考；才把“人间”真的建设为可把我们不断打开、冲刷、涤洗的知识、思想力量，一种不断可对实际无视“人间”的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规划进行穿透、分析、批判、解毒的力量，一种不断提供基于活生生的生命、生存感受有效激发我们人性发舒、社会解放的建设性力量。

也就是，“人间”在我们，是对象，是目的，也是方法。是实践介入的方法，也是知识、思想的方法。明了这个，就不奇怪，《人间思想》的第一辑专题为什么会是“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1949”，第一次的回应笔谈为什么会是“作为方法的1949”，第一辑的总名为什么会是“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因为，这正是我们把“人间”作为一种重要知识、思想方法信念的落实。

三

希望《人间思想》长久，希望我们能办《人间思想》越好，希望大家喜欢《人间思想》，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有兴趣：用“人间”逼视思想，以真的做到“在人间”理解、感受、思想……

注释

[1]《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在《人间》杂志创刊号（1985年11月）2-3页刊出时，标题“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上面用小字标的是“创刊的话”，等到收入人间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8《鳶山》时，则“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标题变成了小号字，写在其上的“《人间》杂志发刊辞”用的是大号字。

目 录

发刊词

高士明 ii

写在前面

贺照田 iv

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1949

胡风在一九四九年

倪 伟 2

徐悲鸿与新中国——围绕《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思考

莫 艾 24

“马恒昌小组”——以工人阶级建国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

何 浩 68

“实质民主”——从 1949 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

程 凯 90

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国际观”的形成

何吉贤 116

对“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 1949”的回应

作为方法的 1949

佐藤贤 144

新中国文化政治的多样性

罗岗 148

如何突破我们内部的墙壁？

白池云 154

新中国与马来亚——离境与革命话语的再生产

魏月萍 158

1949，尚未完成的事件

高士明 164

“在人间”思想

从李叔同到释弘一——意义危机时代的信仰历程

李淑珍 170

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

赵刚 212

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

郑鸿生 230

当“人间”逼视思想

从“省港澳”到“粤港澳”——历史失忆与现实定位

程美宝

264

以《神史》为方法

贾雪梅

280

历史的主体与普遍性的再思考（上）

刘志伟 孙 歌

292

胡风在一九四九年

徐悲鸿与新中国——围绕《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思考

“马恒昌小组”——以工人阶级建国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

“实质民主”——从 1949 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

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国际观”的形成

一

1948年12月，国共内战大局已定，上海的空气也越发紧张起来。胡风得到消息，自己已被列入黑名单，便遵从劝告，躲到一位友人家里。^[1]上海看来是无法再留了。

从1947年11月起，中共即开始安排将一些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撤至香港，再等待时机转往解放区。郭沫若、茅盾分别于1947年11月和12月抵达香港。胡风也曾得到周而复、阳翰笙等中共党内人士的书信或是面告，希望他去香港，但胡风认为这只是他们个人的意见。^[2]从1948年3月起，邵荃麟、乔冠华、胡绳等人在《大众文化丛刊》上发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3]遭到来自自家阵营的猝不及防的打击，对于去香港，胡风内心自然更加抵触了。从6月起，他开始埋头写作《论现实主义的路》，反击香港

方面的批评，至9月17日完稿。此时他已接到中共邀其赴港的正式通知。再迁延不走，就会坐实那种传言：他不离开上海，是为了“闹独立性”。^[4]12月9日，胡风终于只身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

离开已成为危城的上海，胡风并没有感到逃脱樊笼的轻松，相反倒是抱有一种迎接战斗的心情。在九、十月间给舒芜的两封信中，胡风把香港方面的批评比作一场战争，“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5]“他们一面在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断宣传）来抵抗、反攻，一方面尽力想逼我去‘谈谈’，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6]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到了香港后，却没有人主动来找他谈理论问题，只是在一次有邵荃麟夫妇、乔冠华夫妇和冯乃超夫妇以及周而复参加的聚餐的饭后，乔冠华曾问起对他批评文章的意见。

胡风在

一九四九年

倪伟

见，他当即说已经写了反批评文章，而且花了一点力气搞清楚了乔文中所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问题。几天后，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来找胡风谈话，希望在他进解放区之前解决这场论争，双方“分别写个什么表态文章，都承认自己有错误，要用党的文艺路线来改正错误”，但胡风却没能领会潘的意思，而表示文艺理论问题不可能也没必要急于求得什么解决。^[7]

胡风不肯服软，除了个性倔强之外，也因为觉得真理在自己这一边。在完成《论现实主义的路》之后，他显然觉得已经彻底清算了长期缠绕进步文学的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问题，同时也已将自己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内涵解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低头认错，确乎很难。单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香港方面的批评的确无法说服胡风，无论是批评他的主观论忽略了“社

会物质生活关系”及“阶级斗争的理论”^[8]，还是贬斥他对作家主观意志燃烧的强调只是唱高调，“其结果不是什么作家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而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主观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现实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9]，其实都是夸大而虚浮的指责。与香港方面的批评相比，胡风关于“主观精神”的阐述显然更加缜密而雄辩。争论的焦点实际上落在作家如何和人民结合这个核心问题上，正是在这里，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首先在对“人民”的评价上，胡风秉承五四启蒙的传统，一方面肯定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在“人民的生活要求或战斗要求里面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10]，革命文艺的任务就是要反映出人民“在斗争里面成长的坚强的性格，在重压下面奋斗的坚强的性格，在苦痛的生

活负担下面觉醒的善良的或坚强的性格”^[11]。“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12]，在他看来也是主观公式主义的一种表征。乔冠华虽承认“人民有缺点”，但他强调“人民的主体是健康的”，并认为“把人民善良、美德、坚强和康健的主体置之不顾，而却去强调那些他们自己不能负责的缺点……事实上是拒绝乃至反对和人民结合”^[13]。可见两人强调的重点不同，胡风强调要揭示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并写出他们觉醒和成长的过程，而乔冠华则强调人民的主体是健康的，作家“先要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4]，换言之作家的任务首先是向人民学习而不是批判。

其次是在对知识分子作家的定性上，乔冠华明显地将知识分子作家和人民群众区分开来，他把知识分子作家归于小资产阶级，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不能自以为正确地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这样的立场“必然是抽象的，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必须“真正地走到工农群众及其斗争中去”，否则就不能和人民结合，也“不可能真正表现出人民斗争的真实”。^[15]胡风则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他们在社会的激变中已经无产阶级化，所以“也是人民”。而且从革命的意识 and 思想首先是由知识分子提炼总结并传播开来这一历史事实看，知识分子还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

桥梁”，因此可以说革命知识分子不仅是“人民的”，而且还是“先进的”。基于此，便不能断然认为知识分子作家只能“实际上宣扬小资产阶级所有的一切”，鲁迅的榜样表明和人民有着联系的知识分子作家“依然有可能在相应的程度上进入人民的内容，汲取人民的要求流在自己身里，因而把握到历史现实的真实的本质”。但他又同时指出知识分子作家仍然需要进行自我改造，知识分子残存的所谓“优越感”以及生活的非赤贫化，使他们难以“完全抛弃幻想，因而滞留在自作多情但实际上却是虚浮的精神状态里面。这种游离性使得他们的思想立场停留在概念里面或漂浮在现实表面，不容易变成深入实践过程的战斗要求”，“如果不能克服这种游离性，就不能真正使感情（同时也是思想）发生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胡风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深入人民的内容”，才能使他的这种二重人格在“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当中得到改造。^[16]

最后，与上述两点紧密相关的是，知识分子作家怎样才能和人民结合，获得一种真正属于人民的“主观”呢？乔冠华引用了毛泽东《讲话》中的观点，强调作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而且他还要首先放弃作为外在批判者的主观立场，不能用自己带去的“思想体系或人格力量”来批评人